

皖南

农村调查

唐宗力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皖南 农村调查

唐宗力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皖南农村调查/唐宗力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307-09222-8

I. 皖… II. 唐… III. 农村调查—调查研究—皖南地区

IV. F32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120 号

责任编辑:陈 红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9.75 字数: 139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222-8/F · 1590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30 多年前，作为高考制度恢复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学生，我们那时都被认为是社会的佼佼者和幸运者。而我们也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当入夜后，学校图书馆灯火通明，阅览室里座无虚席。回到宿舍后，大家还议论着国家大事，评论着过去，关心着未来。那时，常常困扰着我们，而又常常被议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明清时期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未能在中国最终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近代中国是否存在着适宜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学术界也在热烈地讨论着这个问题。可是，他们的文章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回答。那时的我，只是一个青年学子，才疏学浅，自感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可是，我还是觉得，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寻求答案。而要弄清楚这一切，又必须从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亦即农村中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宗族社会入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封建王朝的社会结构，正是建立在这大大小小的地方宗族社会之上的。

费孝通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曾在苏南的农村作社会调查，并写了一本《江村经济》。我非常想仿效费先生，在农村住一段时间，把农村社会的状况摸一摸。大学毕业后，我接着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去农村调查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后来，我出国留学，从经济学转到社会学，并在美国大学工作、教书和作研究，转眼间已经过去 30 多年。

然而，我想去农村作一次调查的兴趣丝毫未减。2009 年春，在我任教的美国奥本大学的支持和赞助下，我终于圆了做了 30 多年的梦，在皖南农村进行了约四个月的社会调查。调查涉及泾县、歙县两县五个行政村，六个姓氏家族。调查的目标还是农村的宗族

社会，然而，它却有了新的含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蓬勃发展，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对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一旦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被取消，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中国的城市化将迅猛向前发展。我们这次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城市化对农村宗族社会和宗族文化的影响。本书是笔者利用这次调查成果写成的第一本书，着重介绍和分析了我们所调查的皖南五个行政村的社会经济现状，包括土地承包、经济收入、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计划生育和农民思想行为观念等。关于农民工进城和城市化对皖南农村宗族社会和宗族文化的影响以及地方宗族社会和宗族文化的形态和发展方向，将作为一本英文专著出版。

这次在皖南农村调查，得到了黄山市委、歙县县委、县政府、泾县县委、县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歙县县委办公室的曹雄威和郑飞舟先生，直接参与了我们的调查。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和西南政法学院的王珩、程名以及凤维苏一起参加了我们的调查，并协助笔者作了大量工作。泾县退休老干部郭兆先、吴金宝、凤元福等给笔者提供了大量资料。歙县县委办公室、泾县县委办公室、泾县茂林镇政府、歙县昌溪乡、雄村乡、溪头镇、许村镇政府以及各行政村村委会为这次调查作了大量工作，并给予诸多便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谢意。另外，我的夫人凤维群担任了全书中文打字的繁重任务，没有她的鼓励和帮助，这本书是难以完成的。

这次农村调查也得到了国内许多老同学的支持与帮助，谨向他们表示深切谢意。

谢谢所有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们！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宗旨与方法	1
第二章	二县五村之概况	7
第三章	二县五村农民经济生活状况	25
第四章	外出打工与移民	46
第五章	农民工与徽商	72
第六章	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	87
第七章	亲族关系、地方宗族社会与村级自治	104
第八章	宗族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	126
附录	样本调查问卷	144
后 记		152

第一章 研究宗旨与方法

一、研究缘起

2009 年年初，笔者利用一个学术长假，携带助手，在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四月余的社会调查。调查涉及泾县、歙县两县五个行政村，六个姓氏家族。调查目的在于探讨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民工大量进城，对皖南农村地方宗族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阶级斗争的压力不再存在，因而有很多人观察到宗族社会与宗族文化在农村的“复兴”。这种“复兴”是将持续下去，还是只是昙花一现，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更重要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蓬勃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现在大约有两亿多农民在城市打工、生活。国外学者将之喻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目前，在很多中小城市，农民工已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就学、就医的权利。计划经济时期向城市居民供应商品粮的制度也早已取消。2009 年年底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居民的户籍限制，对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别，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这些都为农民移居、定居城市创造了条件。农民离开他们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必将割断“这群人”和其亲族的地域关系，从而破坏构成宗族社会的重要因素——“共地”。这就有可能终结存在了几千年的地方宗族社会，并对传统的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冲击。

我们之所以选择泾县和歙县进行调查研究，是考虑到这两个县

与徽州文化的联系。泾县位于徽州文化的边缘地区，歙县则是徽州文化的中心地区，两个县可进行一些对比研究。与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不同，近代徽州宗族社会和文化受外来影响较小，是我国宗族社会和宗族文化（即儒家文化）保存最完整、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另外，徽州历来地少人多，有七山一水二分地之说。山地占全区面积的70%左右，水域面积占10%，仅剩20%的可耕地。这20%的可耕地近一半为宅基地。所以，人地矛盾异常尖锐。历史上，为了生存，徽州人不得不外出经商，因而诞生了闻名于世的“徽商”。今天，人多地少的局面并没有任何改变，因而，徽州及邻近地区成为安徽省向外输出劳动力的重要地区，而安徽又是劳动力输出的大省。因此，这两个县是考察农民工进城（或城市化）对宗族社会、宗族文化的影响的理想目标地区。

调查中，我们采取了文化人类学中常用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学中常用的“样本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从时间上看，包括历史和现状两部分。通过历史与现状的对比，来发现农村宗族社会与宗族文化的变化。调查从内容上看，包括因、果两部分。农村内部以及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因，宗族社会与宗族文化的变化是果。我们这次在农村调查了六个姓氏家族（或宗族）的房支结构、宗族组织、宗族祠堂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及五个行政村及周边地区现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包括：土地承包、经济收入、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情况。同时，还调查了宗族文化的外在形态，如地方民俗、传统习惯及其内在形态，如农民的思想行为观念等，获取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回美国后，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感到有必要将有关农村现状这一部分，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和农民思想行为现状这一部分资料尽快整理出版。因为，第一，国内极少有人在农村特别是在皖南农村进行这样长时间、全面、深入的个案调查。第二，这些资料和数据经过整理和分析后，有助于地方各级政府及时掌握现时的农村状况，给他们提供一些决策上的参考。第三，给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可进一步研究的平台。第四，为一切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种对农村现状的严谨描述和分析，便于他们深入了解这一问

题。此为笔者写作此书的动机。

关于改革开放以及农民工进城对徽州地方宗族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拟作为另一本英文专著出版。

二、调查和研究方法

本次课题的研究单位为家族或宗族。在皖南农村，一个大的家族，通常就是一个自然村，或几个邻近的自然村。因此，研究单位也可以说是“村”。目前，农村的基层单位为行政村，所以，研究单位也可以说是“行政村”。这次，我们调查了泾县的一个行政村——凤村，歙县的四个行政村——雄村、岑山渡、昌溪、溪头，涉及居住在这五个行政村的六个姓氏：凤、曹、程、吴、周、叶。这几个姓氏，都是在当地比较有影响的大姓。

如前所述，本次研究采用了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和社会学中的“样本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强调研究者亲身亲历，长期参与土著人或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观察调查对象的行为、信仰、习惯及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活动，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所以，笔者在2009年的正月初四即率领助手赶赴泾县、歙县。在调查的这几个村住了一段时间，实地观测、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采访了各个姓氏的耆宿名人，与村、乡、镇、县的各级政府官员进行多次座谈，了解了当地民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拍摄了大量照片，录制了几十盘磁带的访谈素材。

文化人类学中传统的“田野调查”，适用于研究孤立于现代社会之外的原始部落，或与主流文化隔绝的异质文化。但是，对于研究存在于中国农村已长达几千年的宗族社会以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宗族文化，这种方法明显不足。第一，田野调查专注于某一个村落或某一个小型社会的研究，难以获取大面积的观察数据，并与其他村落、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第二，通过“观察”所获得的资料难以进行定量分析。第三，通过村民的口头传说，可以获得一些历史信息。但是，准确性和时间跨度受到限制。第四，从古代到

现代，农村宗族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的大社会，始终处于互动状态。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如此。所以，以村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的变化，必须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来考察，而传统的“田野调查”难以胜任这一任务。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学者 Freedman (1963) 和 Skinner (1964) 即对“田野调查”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一方法仅适用于原始社会中的小地方研究。^{①②} 其他一些学者 (Marcus 和 Cushman 1986; Clifford 1986)，则认为“田野调查”难以反映小社会与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③④} 90 年代，中国学者乔健 (1995) 和王铭铭 (1997) 也认为该方法不足以反映中国宗族社会的庞大体系与复杂的社会特点。^{⑤⑥}

为克服以上缺陷，我们对“田野调查”方法做了如下调整：第一，将调查扩大到二县五村，而非专注于一村。第二，引入社会学中的“样本调查”，以弥补“观察”的不足。“样本调查”的结果可进行定量分析，“样本调查”的结论可推广到其他地区。第三，引入图书馆研究，以获取历史资料，并将资料收集扩大到“村”以上的社会单位，如区、县、市乃至全国。以官方档案、统计数据、图书馆资料，即间接资料来弥补观察资料的不足。图书馆研究，以收集县级或县级以上单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为主。

我们的样本调查设计了一份问卷，问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人背景专题，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家庭成员、家族中的辈分、家庭及个人经济状况。第二，农民工进城专题，包括受访者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市的工作性质、打工收入、打工年限、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以及未来愿景。第三，宗族文化与思想观念专题，包括受访者对一系列有关伦理道德、宗族关系问题的看法与态度（详细的问卷内容见附录）。

我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选择受访者。为了做到点、面结合，即既要扩大考察的面，又必须有考察的重点，我们将泾县凤村作为考察的重点村落。从凤村所有农户中随机抽取 100 户农户。歙县四个行政村作为“面”的考察对象，从四个行政村所有农户中

同样抽取 100 户农户。我们找农户访谈时，有一些农户无人在家，有一些农户不愿意接受访谈，有一些农户回答问题不完整，最终从 200 户随机抽样的农户中获得 170 份有效答卷。除了对随机抽样的农户进行设定的问卷调查外，还对一些农户和个人进行了专题访谈。在每一个行政村，我们还与某些特定农户和个人举行了小组座谈。所以，实际访谈的农户远远超过了 200 户。在泾县凤村调查时，正值农历新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大多回家过年。这些人一般在正月十五前后即要返城，因此，凤村的调查有较多在外务工的中青年人参加。在歙县调查时，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已返城，因而访谈对象中中老年人较多。由于问卷调查涉及他们的家人，我们仍能获取必要的外出务工的信息。

问卷调查以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笔者参加了不少面对面访谈。有一些访谈由笔者的助手进行。歙县县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参加了在歙县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之前，笔者对他们进行了短期的问卷调查训练。

访谈对象大多为该户的户主，也有少量户主的子女。访谈对象中，男女比例分别为 67% 与 33%。其中青年人（19 ~ 39 岁）占 43.8%，中年人（40 ~ 60 岁）占 39.4%，老年人（61 岁以上）占 16.8%。问卷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和已婚子女，所以有效问卷实际覆盖面要远大于 170 户。

三、本书的结构

本书主要利用我们在调查中获取的有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农民生活现状、地方宗族社会现状、农民思想观念现状等资料撰写，分为八章。第一章，即本章，为引言。第二章，对我们所调查的二县五村作了简要介绍。第三章为二县五村农民生活现状的调查，同时考察了当前农村的土地关系和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的态度。第四章为二县五村农民外出务工以及向城市移民状况的调查。这一章还简要介绍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及向城市移民的历史，以此作为我们在考察这一问题的借鉴。第五章对历史上的徽商以及

现在的徽州农民工外出务工和移民作了对比研究。第六章为二县五村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状况的调查,着重分析传统观念及其对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第七章为亲族关系、地方宗族社会与村级自治的调查,着重讨论地方宗族社会的现状,农村家庭模式的变化以及在村级自治中宗族势力复活的问题。第八章为二县五村农民思想观念状况的调查,着重考察宗族文化和传统观念对农民的影响以及在商品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大潮中,农民观念的现代化问题。

注释:

- ① M. Freedman,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3, 14(1): 1-13.
- ② G. W.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4, 1965, 24: 3-34, 195-228, 363-399.
- ③ G. Marcus and D. Cushman,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2, 11: 25-69.
- ④ J. Clifford,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Writing Culture*, J. Clifford and G. Marcus(eds),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⑤ 乔健.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1).
- ⑥ 王铭铭. 一个闽南村落的家族、社会与国家.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1997(83): 51-120.

第二章 二县五村之概况

本章将对我们所调查的泾县、歙县以及凤村、雄村、昌溪、岑山渡和溪头等五个行政村和居住在这五个村的凤、曹、程、吴、周、叶等六个大姓作一简要介绍。

一、泾县及凤村概况

1. 概况

泾县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北麓，太平湖畔。境内山清水秀，重岩叠翠，溪流滢洄。总面积 2 059 平方公里，人口截至 2007 年约 35 万。该县东临宣城、宁国，南界旌德、歙县，西接青阳，北依南陵。旧志云泾县境内：“山势雄峭，波流奔倾……当吴楚之交会，为池歙之襟喉。”泾县南乡之晨如图 2-1 所示。^①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纸，即产于泾县。该县因北邻江南平原，南接徽州山区，历史上成为江浙文化与徽州文化的交接地区。泾县北部受江南文化影响，南部则受徽州文化的强烈熏陶。近代开埠以来，西方文化和商品首先到达沿海地区，通过长江向内地扩散。由于地理上的特点，泾县农村可能先于封闭的徽州山区而受到西方文化、商品经济和新思想的冲击。

凤村位于泾县南乡，距县城 35 公里。与江南名镇茂林毗连。宋至清，凤村与茂林同属冠盖乡。明初建思齐都。清乾隆年间在思齐分建永宁都。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都划分为七个行政村，包括鸣凤、沈岗、金粟、阳山、石井、溪塘、明塘。1952 年这七个村分属唐井、金山两乡。1956 年两乡合并为鸣凤乡。



图 2-1 泾县南乡之晨

1958 年鸣凤乡划归茂林公社，1961 年又从茂林公社划出，建置凤村公社，1984 年改为凤村乡。^②2005 年乡镇调整，鸣凤、阳山、凤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划归茂林镇。现在，凤村（行政村）辖区面积 2.45 平方公里，包括 22 个村民组，共 675 户，总人口 2 166 人（2008 年统计）。耕地面积 2 924 亩，山场 8 841 亩。鸣凤河穿村而过。凤村属丘陵地区，但四周重峦叠峰。境内小龙山，海拔 905 米。螺丝旋，海拔 817 米。^③

选择凤村，主要的考量是其地理位置。凤村地处泾县南乡，如前所述，历史上，它深受徽州文化影响，同时，又有一些江南文化风韵。江南文化相对开放，徽州文化相对封闭保守。凤村境内虽有高山，但大部分还是丘陵地区，不如徽州山区那样封闭。因而，近代以来，一方面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先于徽州受到较多新思想的影响。笔者 30 多年前在大学读书时，学校组织去茂林实地考察皖南事变，曾路过凤村。皖南事变激战地——东流山以及叶挺被俘前召开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的地点均在当时的凤村境内。笔者为凤村浓郁的徽州文化和大量明清风格的民居所深深吸引。那么，为什么不选择毗连的茂林呢？茂林的名气可比凤村大得

多。茂林自北宋建制以来，迅速发展为商业集镇，已丧失了农村特点。聚居在茂林的吴氏家族，历史上名人辈出。仅近代就有所谓吴氏三杰：书法家吴玉如、画家吴作人、文学家吴祖缙。这种商宦社会，不能视为泾县农村和地方宗族社会的代表。而凤村一直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单位。聚集在凤村的凤氏家族，历史上比较沉寂，不如吴氏家族显赫。泾县农村，大多由这样普普通通的村落和家族构成，所以，选择凤村更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凤村民居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凤村民居

2. 凤氏姓考及变迁

据凤氏族谱记载，凤氏来源有二：一系南诏王阁逻凤之后。南诏王妻蒙氏，生凤加翼，后嗣以凤为姓。后人多居于云南、贵州。一系汉昭帝之后。汉昭帝的儿子徙迁陕西邵阳。因汉武帝疏隔诸子，汉昭帝之子遂改姓凤。^④故而，凤村凤氏族谱冠以“邵阳谱系”。徽州包括泾县各宗族修谱时，多有攀高之嫌，此说姑妄听之。至于凤姓的最初来源，可上溯至上古帝少昊。少昊以百鸟称谓百官，以鸟纪官。后世以官名为姓，便是凤氏起源。凤村凤氏嫡祖

为北宋汴梁副统制。靖康之难后，随宋政权南迁至浙江定居下来。后有一支迁至江西。凤村的始迁祖——凤世杰，属于这一支派。凤世杰为朱熹弟子，南宋淳熙乙未贡举。嘉定元年，官授泾州（泾县）教谕。后来，居泾附籍，定居凤村，至今已历八百余年。凤世杰后人在明成化年间有一支迁至宣城西河，有一支回迁江西。另外，还有分支迁至福建、苏州、徽州、庐州、舒城等地。

以上为凤氏族谱上的说法。我们在凤村调查时，听到却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凤氏的老人都说，凤家的祖先姓刘，为后汉皇室后裔。后汉灭于后周，后周又为北宋所灭。宋初，后汉皇室逃到现在的凤村，听到凤鸣之声，认为是祥瑞之兆，便定居下来，改姓为凤。由于惧怕朝廷追杀，族谱故意写上始迁祖来自江西。同时，为表示与朝廷不合作的态度，定下“凤不上朝”的族规，为族人世世代代尊奉，这也是历史上，凤氏族人极少有人做官的原因。我们曾查阅过泾县县志，至少在明清两代，凤氏族人中没有一人中过举人、进士。

据清光绪丙戌年的手抄本《邵阳谱系》，凤氏历史上就没有老谱。元、明时修谱，只提到汉昭帝之子为凤氏第一代高祖——凤演公，“其后至宋代名目俱无”。也就是说，从汉至宋，无从考证。有人说，这就回避了五代末至北宋初，后汉宗室改姓的历史，并间接承认凤氏本为刘姓的事实。^⑤

《邵阳谱系》以世杰公为始迁祖，南宋时从江西迁至泾县。《邵阳谱系》还载有凤氏13世孙凤泰和于元正四年写的序文。如果一世以30年计算，则始迁祖世杰公应在五代末或北宋初来泾。这与凤氏为后汉皇室后裔，于北宋初年来凤村定居的传说是一致的。也有人说，凤氏族谱有意回避这一点，正好说明他们有难言之隐。^⑥

前面说过，明成化年间，凤氏一支迁往宣城西河。作者在凤村调查时，觅得一本该分支的族谱。上面记载了凤氏一世祖凤演公（汉昭帝之子）至凤村始迁祖凤世杰的完整谱系。凤世杰为演公第34代孙。若以30年为一代，约1020年，差不多等于自汉昭帝至南宋初年这一段时间，这就弥补了《邵阳谱系》所存在的空白。

所以，凤村的民间传说是否正确，仍然存疑。^⑦另据《邵阳谱系》凤村凤氏辈分排行，前代 24 派为：“世、彦、盛、万、岩、正、五、伯、廷、云、何、卿、士、日、远、生、宗、昌、庆、阳、林、子、世、有。”其中，二甲与十甲自“何”字后，略有不同。二甲的“何”字后接：“鼎、老、庆、和、安、信、昌、鸣、廷、文、一、尚。”十甲的“何”字后接：“鼎、泰、老、庆、和、安、祥、德、世、廷、文、一、尚。”后代 20 派为：“国、家、兴、必、大、天、运、兆、元、良、惟、汝、嗣、之、懋、任、从、永、继、祥。”另有女派 20 字，从国字起为：“莲、芳、清、媛、德、长、念、容、度、良、慈、孝、家、道、顺、繁、衍、百、世、昌。”现在，凤姓人以“良”字辈居多，也就是说，自始迁祖至今，已繁衍逾 34 代。

二、歙 县

在歙县调查，我们选择了昌溪、雄村、岑山渡（又称航步村）、溪头等四个行政村。歙县建置于秦代，北依黄山，南临千岛湖。山川秀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古称新安，为古徽州府治所在，是徽州文化的中心。宋代时，就被誉为“东南邹鲁”。

在歙县的调查，是“面”与“点”的结合。既要适当扩大调查范围，又不可全面铺开。因此，我们决定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行政村进行调查。歙县县委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们推荐了一批。其中，有的村如棠樾，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有的村，如许村，已发展成繁华市镇，商业气氛浓厚。所以，我们最后挑选了既反映徽州文化特色，又仍然保留着农村特点的昌溪、雄村、岑山渡、溪头等四个村作为调查对象。官商儒一体为徽州文化的最大特色，而这四个村又正是这种文化特色的代表。我们将在下面作详细介绍。歙县新安江如图 2-3 所示。